

# “开民智，兴民德”：清末四川半日学堂 述论（1904—1911年）

王振刚，兰曼心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设立半日学堂是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推广社会教育的重要举措。半日学堂以“开愚氓知识”为宗旨，以“开民智，兴民德”为目标，其教学灵活、课程实用，一度成为社会实施教育普及的主要方式。四川半日学堂发展较快，其数量取得了全国第一。然而，随着清政府渐次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其实际价值和效用受到质疑。尽管如此，半日学堂作为中国扫盲教育的开端，是一次社会教育的有益尝试，其开创性仍值得肯定。

**关键词：**清末四川；半日学堂；社会教育；扫盲教育；教育普及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19) 04-0050-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9.04.008

“Developing the People’s Wisdom and Promoting the People’s Morality”:

A Review of the Half-day School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904 – 1911)

WANG Zhengang, LAN Man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lf-day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o promote soc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New De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e Half-day School is the “eliminating ignorance of knowledge” and aims at “developing the people’s wisdom and promoting the people’s morality”. Due to the flexibility of teaching and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curriculum, the school-running style once became the main way to implement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Half-day Schools in Sichuan province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the whole country.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gradually established easy-equipped literacy schools, but their practical values and utility were still questioned. Even though, as the initiation of the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Half-day school is the beneficial attempt for the social education with positive pioneering.

**Key words:**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half-day school; social educ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半日学堂是1903年以来，全国各地相继设立的供贫民子弟尤其是年长失学者学习，且以“半日读书，半日谋食”为基本办学方式的社会业余补习学堂。其办学目的在于普及教育、开通民智。其名字不一，或称半日学堂，或称半夜学堂、某某夜课，又或称某某讲社等。半日学堂是清末政府推广社会

教育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扫盲教育的开端，它对于清末的成人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教育意识的转变，是中国教育近代化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四川省半日学堂发展迅速，在数量上曾取得全国第一，尤为典型。其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在政治濒临崩溃时期自救式教育改革的奏效程度，

收稿日期：2019-04-10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特区（群）资助项目（G2018-07）。

作者简介：王振刚（1979—），男，河北大名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边疆史研究；兰曼心（1996—），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边疆史研究。

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学界对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这些成果主要是在新式教育整体机制及其影响、新式教育下的学生群体、教育改革与社会关系、地方新式教育改革情况等领域的研究。作为新式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半日学堂的相关研究, 学界也有所关注。其成果主要有张江波的《新式学堂与平民教育: 清末半日学堂述论》<sup>[1]</sup>、高俊的《半日学校与清末社会教育》<sup>[2]</sup>等文, 大致概括了全国半日学堂的普遍性质、教育对象及分类等情况。但这些成果欠缺对半日学堂价值的评估, 所用史料也不见有更新。此外, 其他对于四川半日学堂的研究, 更是散见于各论著之中, 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例如: 李丽华的《防区制时代的四川民众教育》<sup>[3]</sup>, 将半日学堂的开办作为四川民众教育缘起之一, 略有介绍; 唐彬源的《清末半日学堂研究》<sup>[4]</sup>, 主要论述了全国半日学堂的总体情况, 其中偶有涉及四川半日学堂的材料, 但不深入, 无法突出个性的区别。鉴于此, 本文以清末四川半日学堂为研究对象, 从其兴办背景、发展情况及社会价值进行择要考察, 不足之处, 敬祈方家指正。

### 一、在川半日学堂兴办背景

其一, 社会群众受教育情况亟待改善。“蜀中风气初开”, 民众的知识水平“从未识字, 毫无智识, 极可怜悯”, 就四川南部来说, 晚清时期文盲人数就占了总人数的80%以上。<sup>[5]</sup>官绅士庶尚未知办学之意务在“开通民智, 振兴实业, 使人人知力学自强”<sup>[6]</sup>。再有, 中国“以士为贵, 工商为贱, 由来久矣”, 故“为工商者大都不能知书识字”。如此情景, 开民智、兴实业的迫切需求, 促成了半日学堂一类业余补习学堂的兴起。

其二, 教育普及工作难以推进。普及之所以难, “因教育之道, 每与经济意会相冲突”<sup>[7]</sup>。所以, 为避免此冲突, 而又达到教育普及的目的, “殆不在学堂, 而在学堂之补助机关补习学堂”<sup>[7]</sup>, 即补助机关之一。半日学堂, 补习之意。年幼家贫而一日未学者, 就学则需谋生, 就生则难求学, 半日学堂提供了一兼全之道。

其三, 效仿德国、日本教育之道。《四川学报》在推广半日学堂的文章中就提道: “德国教

育, 号称最为发达。全国之人, 殆无不识字者, 此何以故, 正以补习学堂发达之故。日本变法之初, 亦设许多简便求学之方。以期教育之易于推行, 此可见补习机关之最要也”<sup>[7]</sup>。所以, 要实现教育普及, 达到全国无不识字之人的目标, 就要发展补习类学堂, 半日学堂则为其一种方式。

其四, 直隶率先开办半日学堂, 成效较好, 对各地开办半日学堂起了引领作用, 对四川半日学堂的兴办也起到推动作用。四川鉴于天津建立半日学堂振兴学务取得成功, 因而在1904年9月在《四川官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普通教育宜多开半日学堂》的文章, 要求四川各界遵照天津法子, 或募劝捐钱, 或在神会项中提点款来, 不管城乡, 到处多开半日学堂, 为那些无暇无力入学的人寻出一个常受教育的机遇。这样灵活的办学形式于兴起之初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1904年10月, 泸州师范学堂学生杨家彬、章声镛、闵廉等禀请学宪批准, 率先在泸州创办一所半日学堂, 定名泸州半日学堂, 首开四川半日学堂之先河。<sup>[8]</sup>

其五, 清政府在新式教育改革中对社会教育给予了一定重视。1905年底, 给事中刘学谦奏请建议“各州县广筹经费, 设立半日学堂, 专收贫寒子弟, 不取学费, 不拘年岁, 使之无所藉口, 无所畏难”<sup>[9]</sup>, 学部随即颁布《通行给事中刘学谦奏设半日学堂片稿文》<sup>[10]</sup>。1906年1月4日, 学部通咨各省设立半日学堂, 学堂专收贫寒子弟, 不取学费, 不拘年岁。四川省对学部通咨予以回应, 拟定推广半日学堂约法, 共三条: 1. “拟延请一人专任其事, 并选调查员数人襄理之”; 2. “订一简便易行章程”; 3. “先由学务处筹费, 在省城中设立数所, 以为各省之模范。并通飭各州县, 先由学务局筹费, 设立一所, 以为各邑之模范。以期城乡内外, 各处遍设”<sup>[7]</sup>。

### 二、四川半日学堂概况

#### (一) 教育对象

半日学堂从开办之初就明确了教育对象, 即以“贫家子弟”“以贫不能学”的失学者为主。而此类贫不能学者, 主要指年长失学之人, 以不识字为入学标准, 通过“先有本处保甲或亲属先行报名报送”的入学方式<sup>[11]</sup>, “不取学费, 不拘年岁”,

达到“养成普通知识，能自谋生计”的教育目标。半日学堂实则就是社会补习学堂，一则主要针对普遍的年长失学者；二则对已经各安其职的社会成员进行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扫盲教育活动，其对象大多来自社会，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农民。随着国门渐渐地打开，西方种植、培育等农业方法传入中国，对中国农业技术的近代化有一定的作用。故针对农民，“筹设农事半日学堂、农事演说会场，筹议改良棉业、丝业、茶业事宜”<sup>[12]</sup>。江津县张鹿秋还设立农业夜课，教授西方近代农业新法。如此一来，很好协调了农民农作和学习新法的时间。

2. 工人艺徒等。这些人员“急于谋生，无从补习科学”，“从未识字，毫无智识”，半日学堂的开设“令彼受一分教育，亦得一分之益可”。<sup>[13]</sup>在重庆，森昌火柴厂主邹少云就意识到工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于是在厂内设立四字讲社，普及工人教育。<sup>[14]273</sup>

3. 政府人员。这主要针对基层的办事人员，更多是吏胥阶层。为我们所知道的，吏这个阶层一直活动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扮演着饱受争议的角色，大多数胥吏都未受过正规教育，有些靠着自己的努力习得基本的文书和算术技能，但整体文化水平低下。所以，也将他们纳入半日学堂的教育对象。在四川涪州，其州牧陈农便设立了吏胥半日学堂，专收署内吏胥之失教者，以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此也可谓干部教育之先声。<sup>[14]273</sup>

4. 妇女。教育对女性开放，这是新式教育的一大体现。半日学堂同样也对女性开放，主要针对年长女子、“有家事在身者”，其可以通过半日学堂“抽余暇以补习学问”，让其具备写算等普通应有之智识。<sup>[15]</sup>巴县渝中便醴资公立一所半日女学堂，这也是四川设立最早的成人教育妇女班。<sup>[14]273</sup>

## （二）教学设施和师资

半日学堂作为社会业余补习学堂，其灵活性很大。相较于正规学堂，其课堂要求和目标都较低，资金则也相对较少。所以在校舍、桌椅等硬件设施上，半日学堂相对于中小学堂而言，大为简陋，多利用各类公共设施。据记载，1907年，南部县劝学所于县城火神庙设半日学堂一所<sup>[5]</sup>，其就地使用庙宇、公所等，选择其中一个宽敞明爽的房间，

制备高低桌凳、黑板、讲台、图书、算盘、笔墨等件。懋功县将半日学堂设在了龙王庙中<sup>[16]</sup>，江油县也是就城内武庙设立简字半日学堂<sup>[17]</sup>。

而半日学堂在师资方面更是囿于学堂性质、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师资相对于普通学校较为灵活，对教师的背景并不作过多限定，多由普通学校的教师兼职充当，也有由在校学生自创并兼职授课者。重庆一中学堂学生便创立了一个半日学堂，每日分三班，就学者共有二百余人，由学生自己进行授课。有的地方还由当地士绅来充当教员，半日学堂授课者“担任义务，不支薪水”<sup>[18]</sup>。也有政府官吏充当教师，江油县“该县各书吏分班，疑皆复令。该堂教习于单日晚间赴县署内，双日晚间赴高等小学讲演，以期官师”<sup>[17]</sup>。

当然，也有由学堂聘请专门的老师，懋功县一半日学堂“聘金某为教习，令贫苦子弟上午耕作，后入堂肄习”<sup>[16]</sup>。而半日学堂一般只有一名教员，薪水按照十个月计算，每岁两钱六十千文或八十千文。

## （三）教授内容及课程设置

半日学堂这类社会业余补习学校，其以“开愚氓知识，知治生社会之学”为宗旨，为降低社会整体文盲率，提高识字文化水平，所以课程早期设置主要以识字、浅易算术为主。1906年，四川总督部堂奉令通飭各属广设半日学堂，授以农工商艺、浅近新理、识字教育等项内容，以期教育普及。四川懋功半日学堂“以识字、解义、算学为目的”。四川南部县，当时常用的识字课本多为《澄衷蒙学堂字课》《四千字文》。教授分四步走，即识字、习字、联字、书记等环节。具体习字教授方法“先以影本摹写，后以所讲授之字，令逐日写出”，在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进入联字环节，“识字积多，数以联字，贯串成句之法”，懂得字迹和语法之后便开始书记环节，“讲贯渐入，数以书札及记账之式”。<sup>[11]</sup>

然而，随着半日学堂的发展，课程内容也逐渐多元化，在基本的识字写字课程之外，还增加了不少实用课程，以及体操、歌唱、兵式、历史、地理等陶冶情操型课程。南部县半日学堂在开设国文识字课外，还开设了算术课——采取“用珠算先教小九九，次授归除”的方法——“教柔鞍运动步法”的体操课以及“教学是选歌唱、教科书内、通口明

快者, 先以讲说”的歌唱课。<sup>[11]</sup>高俊在《半日学堂与清末社会教育》中提道: “半日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有和普通学校明显的区别, 即不含‘读经’类课程”。但是四川省则不然, 在川半日学堂的课程中随处可见修身、经史等科目设置。据记载, 成都青石桥设立的一所半日学堂“每日功课四点钟授以修身、经史、字课、珠算、笔算、体操、唱歌等科, 已于日前开册报名矣”<sup>[19]</sup>, 重庆中学堂学生所创半日学堂“每日分三班教授, 功课为习字、文法、经史、地理、珠算, 就学者共有二百余人”<sup>[20]</sup>。

#### (四) 经费来源

四川半日学堂主要分三种, 即官立、公立、私立。这三种的办学经费来自不同的渠道。官立, 顾名思义是由政府创办, 负责学堂一切的经费。四川半日学堂在创办初期主要是由政府承担费用, 政府强调“半日学堂为地方所必备, 皆地方学事”, 地方学事“当以地方税供给之, 地方税之性质, 富民之负担”<sup>[13]</sup>。半日学堂的书籍和应用学习用品则由学塾提供, 经费由劝学所支派。

而政府除了拨出经费进行办学, 还多鼓励富民出资开办半日学堂, “学而不纳费是暗中令富民出钱教育其乡里也, 富民有教育乡里之义务”。这种由私人出资创办的半日学堂, 也被称为私立半日学堂。私立半日学堂的创办者多为一些有名望及家境殷实的地方士绅, 如四川华阳徐子轩孝廉“设立半日义塾已于七月中旬在江南馆祠山殿开学”<sup>[2]</sup>, 专收贫苦子弟, 额设四十名, 不取学费。

公立半日学堂是四川开办半日学堂主要采取的形式。1906年始, 川内各地州县遵照学部章程陆续设置半日学堂, 采取“自筹经费、官不经手”的原则组建<sup>[2]</sup>, 多由当地士绅、商、学界人士筹办。据材料, 重庆一半日学堂由学界人士募捐倡办, 以教育贫苦子弟, 但由于经费原因一直迟迟未开办, 三月中, 水果帮以争执, 故甘愿将水果船来渝所抽私费捐入学堂<sup>[21]</sup>, 之后又于南纪门外金轮宫开设一堂, 在小梁子复兴观开设一堂<sup>[21]</sup>。

### 三、四川半日学堂的发展

#### (一) 数量增加, 规模发展

四川地区半日学堂取得初步成效后, 政府欲进

一步扩大规模, 四川各地也纷纷呈请设立半日学堂。“简字半日学堂专以拼音白话教授, 下等社会限时三月毕业。自去岁开办以来, 现已学业一班, 当道以成效显著。乃飭总里一变革孝廉扩充制度, 多设分校, 务期贸易小民, 易于就学以广造就而头愚。”<sup>[22]</sup>也有将一些公立学校改设为半日学堂, “懋功厅稟该屯僻处边隅, 素称瘠苦, 学务困难。自系实情该令拟将木坡等三处公立小学改为半日学堂, 以求实际, 具见办事认真, 非同敷衍”<sup>[16]</sup>。

下表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日学堂在各省的开办情况。从中可以看到, 在1907年到1909年间, 四川半日学堂的数量是最多的, 学生数量也是最多的, 而且四川半日学堂的数量呈大体上升趋势。

表1 1907—1909年半日学堂发展数量一览表\*

地区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京师					9	294
直隶	149	3026	179	4443	168	3853
奉天	3	137	5	229	3	161
吉林	1	20	1	46	3	99
黑龙江	3	92	3	130	1	47
山东	39	797	47	993	50	884
山西	5	149	15	478	23	622
河南	15	313	50	1184	52	1240
江宁	32	1133	10	728	22	530
江苏	91	3887	96	3781	12	457
安徽	19	283	10	271	13	481
浙江	47	1518	56	1598	65	2219
江西	9	206	13	547	9	246
湖北	9	319	23	1481	27	1492
湖南	15	576	26	935	32	1215
四川	160	4725	159	4738	203	6352
广东	11	601	6	539	9	715
广西	11	312	7	249	10	295
云南	7	211	7	147	3	76
贵州	1	51	2	80	5	130
福建	5	130	5	141	7	137
甘肃			1	11	7	152
新疆			7	64	241	3788

\*数据转引自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 2007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92—93页。

#### (二) 质量提高, 效果显露

上文已经提到, 随着半日学堂学生学业水平的

提高,半日学堂成效渐显,四川各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予以相当的支持,促进其质量的提高,而课程内容也逐步多元化,在基本的识字写字课程之外,还增加了体操、歌唱、兵式、历史、地理等陶冶情操型课程,并且其按照对象、时间等,将课堂内容精细化,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在社会层面,得到了民众一定的认可和支持。四川长寿有一教习廖政(号泽溥)独力创办了私立初等学堂,该前县大令赵云孙“查其教法良善,赠以热心教育四字匾额”<sup>[23]</sup>。如此优秀的教习,之后又在初等学堂内附设半日学堂,其一切规则,则悉仿照县城内半日学堂办法,不征学费:“已于七月二十日开堂来学者,约四十余人”<sup>[23]</sup>,而所有开办的费用由廖垫出,县绅余香圃等后闻之,亦各捐助多金,“以期持久该县办学诸君,无不认真将事”<sup>[23]</sup>。而历任各大令,亦复提倡兴学,民智之开通、学务之发达可计日而待矣<sup>[23]</sup>。有经验且优秀的教习热心从事于半日学堂的创办,并且各乡绅听闻纷纷捐助以促进当地民智开,可见半日学堂对于开民智的价值得到民众一定的认可。

### (三) 存在问题

第一,半日学堂在四川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其效用和价值也面临着一些质疑,有请求同其他学堂合并的,甚至有停办的情况出现。

《四川教育官报》在宣统元年(1909年)刊登过一篇文章《贫民教育谈》,其中谈到半日学堂不可办,表示半日学堂是为贫民所办,但是依据当下的国家情势,断不可办半日学堂。当下各种工艺未发,而一般谋生的工作(例如贩卖工艺、送物送报)等,“贫兄亦不惯为之”,再者在学校全日,尚不能改其为良,更不用说在学校半日能使其智识有所长进;因此“欲办半日学堂者必俟诸十年之后”<sup>[24]</sup>。

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奏准简易识字学塾章程,令各地推广设立,“以辅小学教育之不及,而期以无人不学为归”。这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半日学堂作为社会补习学堂的作用,而且得到了学部大力推行。隆昌县设简易识字学塾一案中,“半日学堂与简易识字学塾于教育上均关重要,不容偏废”,但是半日学堂中有收效甚微者,“筹设简易

识字学塾,拟就旧有之半日学堂改办,一律更易名称等,情未免顾此失彼,似宜就已办之各半日学堂中择其办理不合,无甚成效者,酌量改设,款目亦不必加筹”<sup>[25]</sup>。

半日学堂等社会教育模式在四川文化基础较为薄弱地区的推广不尽如人意。1908年,西昌、会理等凉山彝族集聚地区,相继开设了半日学堂,但“历时甚短,无成效可言”<sup>[26]</sup>。

锡良对于西南地区半日学堂的情况进行了一番介绍。锡良上折子说,原本办有十所半日学堂,专收贫民子弟,半日在外营业,半日入学补习,但是凡入堂肄业者概不肯在外营业,而其在外营业者又不肯入堂。这样一来,半日学堂与小学堂毫无区别,既失本意,所以亟宜改作,应即停办半日学堂,以原半日学堂学生并入附属小学堂。<sup>[27]</sup>云南与四川同属西南,且互为毗邻的省份,具有一定的相似度。此材料反映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大众心理,如此说来这则材料对于西南地区半日学堂的普遍问题也是有所表现的。

第二,四川各地出现生源紧缺,无法继续开办半日学堂。四川崇庆州便存在招生难的问题,“详悉该州遵设师范传习,所以原办半日学堂之款腾作该所经费。又以半日学堂现难招生,拟因势利导,暂将半日学堂停办,将现有学生悉行并入简易识字学塾”<sup>[28]</sup>。

泸州一度出现半日学堂招生广告。广告内容一边说蒙学“收的子弟都有定数,功课又多,不准一日耽搁”,又夸城内子弟“狠有可造”,但因为“生意牵挂”“家务稍紧”而被误了学习,还一面将学习的作用娓娓道来。广告内容可谓是字字扣心,着实吸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半日学堂招生困难,而且面临和其他形式学堂的竞争。

第三,四川地方官员态度敷衍,甚至有以此作为假公济私的名目。地方《四川教育官报》上曾刊公牍《督部堂札飭改良学务文》中提到四川省半日学堂的增设:“近来各属此项学堂虽已渐次设立,而未办者尚居多,敷且往往不明宗旨。”<sup>[29]</sup>

直到1911年,四川一些贫瘠边远地区都还未设半日学堂一类社会扫盲识字学塾,四川提学使司下文催办,克期筹设<sup>[14]</sup>274。四川罗江县出现官员将半日学堂的开办经费纳入自己囊中,假公济私,

“成之半日学堂废于中道”<sup>[30]</sup>。

#### 四、社会教育的发展

1909年底, 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 以简易识字学塾取代平民补习学堂, 令全国开设简易识字学塾, “欲以辅小学教育之不及”。1910年1月10日, 学部奏准颁布《简易识字学塾十六条》, 对简易识字学塾教材、教授方法、课时等做了明确的规定。从章程来看, 半日学堂是简易识字学塾的前身, 简易识字学塾是半日学堂的发展, 甚至是晚清成人扫盲和补习教育制度化的标志。而且, 其办学形式相当, 针对的学生也有重合部分, 同样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sup>[31]</sup>随着学部的大力提倡, 简易识字学塾渐有取代半日学堂之势, 四川一些地方也直接停办半日学堂, 将其并入简易识字学塾。据1910年四川提学使司统计, 全省识字学塾计2626所(在小学堂附设2020所, 就祠堂公所特设者606所), 共计学生39390人。<sup>[14]274</sup>

虽说半日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同属于晚清预备立宪时代“开民智, 兴民德”的社会教育行列, 然而简易识字学塾的设立更受朝廷的重视, “今天一通飭, 明天一严札”, “他学校可从缓, 此学塾断断不可从缓者”<sup>[32]</sup>。但是就其主要教育对象来说, 半日学堂主要针对年长之人, “绝望于科举者并区区识字而弃之”, 而简易识字学塾是具有严格规定且重点在于小学之上的学堂, 主要教学对象虽说是年长失学者, 然其学制已经决定了它对年长失学之人没有吸引力。

简易识字学塾有严格的作息和毕业标准。1909年11月, 学部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业余补习学校的识字水平和效率, 统一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 以《简易必读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为其基本教科书, 教学方法上分为三种: 一种三年毕业, 课本约3200字; 一种为两年毕业, 课本约收2400字; 另一种一年即可毕业, 约收字1600个。识字学塾对于家贫年幼者来说, 是一次免费教育的机会; 而对于年长失学之人来说, “开办时学者尚多, 久则日形减少, 推原其故”, “大半皆趋重于生活之计”<sup>[33]</sup>, 以期半日学堂的可变通形式更为年长之人接受。

再者, 从心理角度来看, 时人的观点表明, 年

长人的心理与儿童迥乎不同。如果年长失学之人与贫寒幼小同习于简易识字学塾, “其不能融洽也可知矣”, 但是如果用半日学堂、半夜学堂一类, 号召年长失学之人, 在名义上迎合了其成年人的心理。1911年8月14日, 在学部《通飭札飭提学司简易识字学塾招收学生以年长失学者为限》一文中提到, 简易识字学塾专为年长失学及年幼家贫无力就学者而设, 然而各省并未按照如此来招生。文中提到, 各省轻视初等小学, 专以简易识字学塾敷衍塞责, 而入塾学生又以学龄儿童居多。<sup>[34]</sup>从中不难看出, 简易识字学塾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扮演社会扫盲教育的角色, 而是充当着初等小学的角色。其中缘由, 除了地方官员的处理方式不妥外, 不乏以上提到的两点。

由此看来, 就社会扫盲教育方面而言, 半日学堂同简易识字学塾相比, 更胜一筹, 但是半日学堂并未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而被大力支持的简易识字学塾, 又多作小学教育之用。清末, 半日学堂一类的社会教育落实情况更待进一步考证。

#### 五、结语

科举废除后, 教育改革成了清末的一大难题。面对整体识字率不高的群众, 清政府发现这一问题, 并且效仿西方试图解决。在物质、文化、交通均不发达的时代,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 相较之下其发展和开放程度不比沿海, 群众的识字率更是令人堪忧。其半日学堂的数量在清末位居全国第一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四川省扫盲力度之大, 就学人数之多。

然而, 民众的社会教育并非一日之功。新中国成立之后, 开展了大规模扫盲运动, 但直至1987年四川北川县都尚未脱盲<sup>[35]</sup>, 更不用说清末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而且, 从四川一省来看, 尤其在问题症结所在——文化基础薄弱之地, 并没有完全落实半日学堂等社会教育的政策, 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再者, 半日学堂作为社会教育的载体之一, 其主要作用是“开民智, 兴民德”, 但从四川半日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 除了教授识字识数以外, 仍充斥着旧时经史等内容, 其“民德”如何兴, 兴什么“民德”, 有待商榷。

半日学堂作为中国扫盲教育的开端, 其开创性

是值得肯定的。教育普及从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件理所应当的社会行为, 实则在当时是一种教育意识的飞跃。从教育垄断到教育普及, 这意味着社会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当权者及社会层面的关注,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代延续的垄断知识分子体系的崩塌。民国初年, 教育部鉴于半日学校在推广社会教育方面的成绩和影响, 于1914年2月制定了《半日学校规程》, 首次对半日学校的招生、课程、学制等做了明确规定并继续推行, 在数量和规模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sup>[36]</sup>, 这一借鉴是对半日学堂社会作用的肯定。

### [参考文献]

- [1] 张江波. 新式学堂与平民教育: 清末半日学堂述论 [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4): 95-101.
- [2] 高俊. 半日学校与清末社会教育 [J]. 西部学刊, 2013 (11): 70-75.
- [3] 李丽华. 防区制时代的四川民众教育 [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05.
- [4] 唐彬源. 清末半日学堂研究 [D].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 [5]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 南部县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648.
- [6] 四川学报凡例 [J]. 四川学报, 1905 (1): 4.
- [7] 推广半日学堂 [J]. 四川学报, 1906 (2): 37-38.
- [8] 半日学堂 [J]. 四川官报, 1904 (27): 39.
- [9] 刘学谦片 [J]. 学部官报, 1906 (1): 47.
- [10] 通行给事中刘学谦奏设半日学堂片稿文 [J]. 学部官报, 1906 (1): 47.
- [11] 四川省南部县. 南部县半日学堂简章·入学 [D] // 唐彬源. 清末半日学堂研究.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24.
- [12] 商部奏遵章预筹次年农工商政实行办法折 [J]. 四川教育官报, 1911 (11): 5.
- [13] 孙倣. 箴学生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7 (9): 85.
- [14]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教育志: 上册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0.
- [15] 杨白民. 城东女学社添设艺术科之趣旨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8 (1): 116.
- [16] 半日学堂 [J]. 广益丛报, 1906 (110): 25.
- [17] 江油县禀设立半日学堂请示一案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9 (2): 28.
- [18] 各省教育汇志 [J]. 东方杂志, 1906, 3 (12): 128.
- [19] 半日学堂 [J]. 广益丛报, 1906 (119): 25.
- [20] 工艺速成科课程表 [J]. 东方杂志, 1905, 2 (6): 195.
- [21] 半日学堂又开一所 [J]. 广益丛报, 1906 (117): 25-26.
- [22] 扩充简字半日学堂 [J]. 四川学报, 1906 (2): 117.
- [23] 长寿半日学堂之发达 [J]. 广益丛报, 1909 (221): 78.
- [24] 贫民教育谈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9 (11): 84.
- [25] 隆昌县禀筹设简易识字学塾一案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9 (11): 35.
- [26] 凉山州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志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346.
- [27] 滇督锡奏陈筹办滇省学务情形折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8 (3): 18.
- [28] 崇庆州详筹办官立师范传习所一案 [J]. 四川教育官报, 1911 (31): 18.
- [29] 督部堂札飭改良学务文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9 (7): 24.
- [30] 罗江县视学员条陈学务一案 [J]. 四川教育官报, 1909 (9): 38.
- [31] 奏遵拟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折 (并单) [M] // 大清宣统新法令: 第11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09: 33.
- [32] 庄俞. 论简易识字学塾 [J]. 教育杂志, 1910 (3): 23.
- [33] 雅安地区教育委员会. 雅安地区教育志 [M]. 雅安: 雅安地区教育委员会, 1999: 181.
- [34] 学部通咨札飭提学司简易识字学塾招收学生以年长失学者为限文 [J]. 教育杂志, 1911 (9): 91.
- [35] 四川省《北川县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组. 北川县教育志 [M]. 成都: 成都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1991: 189.
- [36] 陈元晖, 李桂林, 戚名琇, 等.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普通教育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1050-1051.